

· 兰州教师进修学院教学用书 ·

古汉语基础知识述论

谢 磊 撰

兰州教师进修学院

前 言

兰州教师进修学院是承担培训中学在职教师、教育行政部门的具有师范性质的高等学校，是我国社会主义师范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其他全日制高等师范院校。高等师范院校承担培养新师资的任务，而教师进修院校负责提高在职教师的水平，两者是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在职教师的提高好比现役部队，新师资的培养象预备役。因此，就教学内容而言，有些课题和高师院校相当；有些与中学教学直接联系的课题和科目的知识内容，还要比一般高师高一些，专一些。但是，任何知识内容的传授，必须同时考虑到和中学教学的实践对口，要急中学教学之所急，应中学教学之所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深入浅出，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提示知识的传授。这就需要编写出一套与一般高师院校教材有所不同的教学用书。

我院中文科讲师谢磊同志多年来和其他同志一起对古汉语基础知识和中学语文教学中古汉语基础知识的传授问题进行钻研和探讨，形成了一些独到之处。他用三年多的时间，撰写成了这本《述论》。

全书的编写，从中学语文教学和教师进行业务自学的实用着眼，注重基础知识的系统性，尽量体现知识的内在规律。第一讲，论述汉字的特性和文字学知识，以传统的“六书”学说为主线，一方面综合吸取了近代古文字研究的优秀成果，一方面运用了编者个人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如关于“汉字表义形体归类”的设想，既是对传授文字学知识的综合继承，也是让文字学知识为训诂服务的具体实践。第二讲，讲述汉语音韵。编者充分运用个人多年的研究探索成果，大胆地突破传统音韵学生僻术语和玄奥理论的局限，以现代语音学知识为依据，尽量通俗浅易地介绍古今汉语声、韵、调的对应关系，并提供了大量简单明瞭的图表，为中学语文教师和自学进修者提供了知识工具。因此，我们决定刊印这本《述论》，作为我院中文科古汉语的教学用书。

由于条件限制，本书难免疏误，不足之处，恳望读者批评，以便进一步修订，以期趋于完善。

杨 炯 云

一九八三年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讲 汉字及“小学”	(3)
第一节 文字的起源及汉字的特性	(3)
一、文字的起源	(3)
二、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4)
三、汉字的特点和识字的重要	(7)
第二节 文字学和“六书”	(10)
一、文字学和我国文字学研究概况	(10)
二、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及对它的研究和发展	(12)
三、关于“六书”	(14)
(一) 关于“象形”	(15)
(二) 关于“指事”	(16)
(三) 关于“会意”	(17)
(四) 关于“形声”	(20)
(五) 关于“假借”	(27)
(六) 关于“转注”	(29)
第三节 古今字、异体字和繁简字	(32)
一、关于古今字	(32)
二、关于异体字	(35)
三、关于繁简字	(38)
第二讲 汉语音韵学常识	(42)
概 述	(42)
第一节 古汉语的声母系统	(42)
一、辅音、声母和现代汉语声母系统	(42)
二、近古和中古的声母系统	(44)
三、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	(47)
第二节 古汉语的韵母系统	(51)
一、现代汉语的韵母系统	(51)
二、中古的韵母系统	(52)

三、上古的韵母系统·····	(61)
第三节 声调和古今声调的变化·····	(63)
第四节 掌握古今音变规律的实用意义·····	(66)
第三讲 词汇·····	(73)
第一节 如何掌握常用文言实词·····	(73)
一、注意古今词义的变化和联系·····	(73)
二、注意现代汉语的复合词和古代汉语的单音词的联系·····	(75)
三、注意同义词的辨析·····	(77)
四、注意词的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的关系·····	(81)
五、注意词的活用·····	(85)
(一) 名词的活用·····	(85)
(二) 动词的活用·····	(88)
(三) 形容词的活用·····	(90)
(四) 其它词类的活用·····	(92)
六、注意常见的专门词语·····	(94)
第二节 如何掌握文言虚词·····	(98)
一、连词“而”、“与”、“及”·····	(98)
二、人称代词的复数词尾:“侪”、“曹”、“辈”、“属”、“等”·····	(101)
三、疑问代词“谁”、“孰”、 “何”(“曷”、“奚”、“胡”、“盍”)·····	(102)
四、句首语气词“夫”、“盖”、“唯”、“其”·····	(103)
五、否定词“不”、“毋”、“勿”、“无”、“未”·····	(105)
六、语气词“也”、“矣”·····	(107)
七、疑问语气词“乎”、“与(欤)”、“邪(耶)”“哉”·····	(110)
八、合音词“诸”、“焉”·····	(114)
九、特殊代词“者”、“所”·····	(117)
十、介词“以”、“于(於)”·····	(125)
第四讲 句法·····	(135)
第一节 成分的省略·····	(135)
一、主要成分的省略·····	(135)
(一) 主语的省略·····	(135)
(二) 谓语的省略·····	(138)
(三) 宾语的省略·····	(139)
二、其它成份的省略·····	(141)

(一) 介词“于”、“以”的省略·····	(141)
(二) 定语所修饰的中心词的省略·····	(143)
(三) 特殊省略·····	(143)
第二节 词序的“颠倒” ·····	(143)
一、宾语的位置·····	(143)
二、谓语提前·····	(147)
三、双宾语·····	(147)
第三节 一些特殊的句式 ·····	(148)
一、判断句·····	(148)
二、反问句·····	(156)
三、疑问句·····	(159)
四、被动句·····	(160)
五、比较句·····	(164)
第四节 复句 ·····	(164)
一、并列关系·····	(164)
二、选择关系·····	(165)
三、递进关系·····	(165)
四、转折关系·····	(166)
五、因果关系·····	(166)
六、条件关系·····	(167)
七、假设关系·····	(167)
八、目的关系·····	(168)
第五节 语法知识的综合运用及其意义 ·····	(169)
(附) 常见汉字谐声偏旁古韵检韵表·····	(174)

绪 论

“古汉语”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内涵。广义的是指：一切古代的汉语，包括汉民族上古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以及中古以后形成的古代白话；狭义的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上古书面语言，以及后来文人们仿古的书面语言，即所谓的“文言”。

先秦时期的文献典籍和诸子百家著作所使用的“文言”，是我国千古以来文人写文言文的楷模。这是因为以《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以及先秦诸子散文为代表的文言文，无论是基本词汇、语法结构、修辞方法，还是文章的写作体例，都堪为古代汉语的典范。所以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

我们学习和研究的主要是狭义的“古汉语”，也就是“文言”。既然先秦的文言文是历代文言文的典范，自然也就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把先秦的文学语言作为重点，可以收到溯源及流、举一反三的效果。

我们学习和研究古汉语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掌握阅读和研究古代文献资料的语言工具。另外，就语言本身来说，现代汉语的语法、词汇和修辞手段都是古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许多古代的虚词和语言结构直接保留在现代汉语里；许多基本单词从古至今被相当稳定地继承和沿用；现代汉语的复合词，大多是利用古代的基本单音词构成的，它们作为现代复合词的一个词素，仍然保留着原来的一定意义或体现着原来的一些语法作用。没有一点古汉语的知识，几乎不可能正确地理解某些词语的意义，更不可能正确运用。因而，只有学习了古代汉语，才可能更有效地精通现代汉语，提高现代汉语的阅读和表达能力。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学习古汉语，绝不是为古而古，更不是厚古薄今，而是古为今用。

那么，怎样才能学好古汉语呢？我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打破神秘观念，克服畏难情绪。不要把文言文看作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要知道，无论是文言文，还是古代的白话文，都是以口语为基础形成的。而且主要是以北方口语为基础形成的。黄河流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的中下游一带一直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中心。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中心都在今天的山西、陕西、河南一带。上古的文言，也就是当时的“官语”——“雅言”。

西汉以后，文言文和口语逐渐脱节，后代文人虽强调以先秦的书面语言为楷模而为文，但终究逃不脱客观规律的制约，他们的书面语言也总要受活语言的影响，免不了互相渗透，血脉相通。因此，我们的丰富的活语言，就是我们学习古代汉语的一种最有用的工具，我们要善于运用这个工具，要注意发掘我们熟悉的活语言中的文言因素，把它们当拐杖使用。比如，我们常说“奔走相告”、“走马观花”、“不胫而走”，“走”这个词在这些成语中就保留着古义，我们是熟悉的，利用它，就容易知道《孟子·梁惠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的“走”是“跑”的意思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获取知识、形成技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利用已知知识，分析探求未知对象的循迴渐进的螺旋上升的思维过程。如果

能自觉地用这个客观规律引导我们学习，效果自然会较好。

第二、学习古汉语，实际上是个对古今汉语进行比较、认同求异的认识过程。对两者之间的异同分辨得越清晰，学习和研究的也就越深入。为了有效地分清两者在各个具体方面的差异，先得弄清两者最基本的异同：

(1) 古今汉语在语音上虽有许多细小的不同，但最大的变化却是现代北方话中入声调和浊声母消失。

(2) 古今汉语的基本词汇和构词方式是一致的，许多文言词语完整地保留在现代语体文中。如“诞辰”、“酝酿”、“鄙夷”、“所以”、“于是”、“在于”、“渺然”、“茫然”等。古今词汇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为双音节化，即由单音词为主，发展成以双音词占绝对优势。

(3) 古今汉语在语法结构上都缺少形态变化，而以虚词的作用和词序的安排作为主要语法手段。这是汉语有别于印欧语言的主要特点。它决定了汉语语法的灵活性，使之既简易又富于变化。古今汉语的词类和语法结构也大体一致，不同的是：1、古汉语词类的活用更为普遍和常见；2、古汉语中词序的倒置（宾语前置等）和成分的省略情况更为突出；3、某些句式（判断句、被动句和选择性的比较句等）与现代汉语不同；4、古今虚词的更替现象很明显，“之、乎、者、也、矣、焉、哉”等文言常用虚词在现代汉语中全部被新词代替了。

第三、学习古代汉语要注重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只有理论与实践结合，才能达到培养能力的目的，收到预期的效果。感性认识是学习语言的必要条件。要获得古代汉语的感性认识，就得大量阅读古代作品，对典范作品，要结合注释，彻底读懂，要多读熟读，最好能熟练地背诵若干篇。这样，既可以踏踏实实地掌握一定的古汉语材料，还可以培养对古汉语的语感。有了这种基本实践工夫，就有了切实可靠的感性认识基础，它将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和消化所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我们学习古汉语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比如文字、音韵、训诂、语法等知识。这些知识和钳工所用的锉、刨、锤、钳一样，是学习古汉语必备的基本工具。没有它们，就不可能解决一切语言问题。但仅有了工具而不知道如何使用，也不可能把知识转化为能力。比如：掌握常用词当然要靠记忆，但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无多大用处。只有融会贯通，才能运用自如。这就要下功夫进行细致认真的分析、概括、归纳类比，因为古人对古书词义的注释，往往只照顾到特定语言条件下的具体意义，作到“文从字顺”就算了。结果，字典、词典里按字收列的许多古代注释家的训诂，就显得五花八门，杂然纷陈。其实，许多表面上众说纷纭的意义，概括起来只不过是一个基本意义再加上几个引申义而已。而且由本义到引申义还一定要有某种不可避免的内在联系，只要我们真正认识了这种内在的关系，以之删繁就简，芟剪枝节，突出主干，就可以掌握一种高度概括的方法，做到提纲挈领，以一驭万、触类旁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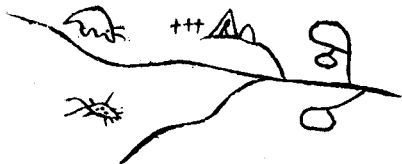
第一讲 汉字及“小学”

第一节 文字的起源和汉字的特性

一、文字的起源：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尚书·序·正义》云：“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正简明扼要地表明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文字是为语言服务的，是借助一定的形体符号对语义进行无声的表达。所以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说：“盖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文字，究其起源，最初都与图画有一定的关系，著名的“奥基布娃情书”最生动地再现了人类最早的书面语言的面貌。据说，印第安姑娘奥基布娃（Ojibwa），要约她的情人在一个地方相会，便在赤杨树皮上写了一封情书，原形是这样的：



左上角的“熊”象一隻熊，是奥基布娃部族的图腾，左下角的“鱼”是一条鱼，是他情人部族的图腾。各曲线表示赴约应走的路线，两座帐篷表示聚会的地点。三个“+”和三个湖泊表示约会地的方位和标志。一个帐篷里画了个人形，表明她就在那里等他。

用一系列简单而形象鲜明的符号表达心意，可谓独具匠心，但是这样的情书，除了她自己和她的情人，别人是很难看懂的。可见，用图画交流思想有极大的局限性。这就要求创造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作为统一的书面交际手段，于是便有了图画文字。我国大汶口出土的陶器上有个铭文写作，是一隻脚的图形，可算是图画文字的最典型的代表。这个，后来演变为甲骨文的或金文的。进而又演变为篆文的，隶书的，和楷书的“止”。整个演变过程，十分清楚地显示了文字是如何由图形演化为纯符号的。

当文字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统一符号定型之后，便逐渐分化为两大体系。一种是表音体系的文字，即用一定的符号记录语言的声音的文字，印、欧、阿拉伯和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

文字都是属于这种体系的；一种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即用一系列表示意义的符号构成的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的最典型的代表。表意文字的基本特点就是字形字义有密切的关系，分析字形极有助于了解字的本义。就使用人口来说，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文字，除了我们中国之外，日本现在还在使用。所以认识汉字，对于全世界也是有意义的。

二、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汉字的历史非常悠久，关于它的起源曾有过种种说法，《世本》云：“仓颉作书”。《韩非子》、《吕氏春秋》也有同样的记载。《淮南子》则说：“昔者，仓颉作书，容成造历”。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更进一步把仓颉造字和《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说法结合起来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盟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递运之迹，知分理之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不过，见解比较深刻的还要数《荀子·解蔽》，他说：“故好书者，众也，而仓颉独传者，一也。”他认为：仓颉只是象后代的李斯、程邈等一样，是对文字进行了统一整理的人。章太炎先生发展荀子的见解，在《章氏丛书·造字缘起说》一文中说：“仓颉以前，已有造书者，亦犹后稷以前，神农已务稼穡，后夔以前，已作律吕也。夫人具四肢官骸，常动持筌画地，便已纵横成象，用为符号，百姓与能，自不仓颉也。”又说：“一二三诸文，横之纵之，本无定也；马牛鱼鸟诸形，势则卧起飞伏，皆可象也，体则鳞羽毛鬣，皆可增减也。字各异形，则不足以合契。仓颉者，盖始整齐画一，下笔不容增损，由是率尔著形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书契。”这个看法，基本上符合文字创造定型的变化实情。不过仓颉是否确有其人，却是值得怀疑的。仓颉造字之说，发源于战国，至汉代大肆流行，并且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比如山东沂南出土的汉画像墓，中室四壁刻着汉以前的许多神话故事，画上有隶书榜题。题有“晋灵公”、“仓颉”、“齐恒公”等，所画的仓颉长着四隻眼睛。而在《路史禅通记》和《春秋元命苞》等纬书里，对仓颉的描写更是奇形怪状，说他“龙颜侈侈，四目灵光”，“生而能书及受河图绿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造文字。”荒唐的演义充分表明：仓颉只是个传说中的人物，象伏羲神农一样，只能视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性代表。他所代表的正是文字由广大人民创造出来后，初步约定俗成，定型统一的时代。在这之前，可以说人人都是造字的仓颉。就是到了甲骨文里，同一字还能写出许多不同的形体，比如“鹿”字可写作𪚩，或𪚪，也可以写成𪚫、𪚬；“犬”可以写作𪚭、𪚮或𪚯等。表明不同的人正是按照自己的观察，从个人最熟悉的角度，把自己认为最有特征的形体作为符号的。可见真正造字的仓颉，是人民群众，不是任何个别的圣人。不过，我们只能说“演义荒唐”，而不能说“传说无稽”。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这个传说。有人认为“仓颉”就是“创契”的转音。我同意这个见解。我认为不应当把仓颉看作一个具体人的名称，他和神农氏、有巢氏等一样，是后来人对整个造字者的尊称。因为谁也无法确定最初造成文字的具体情况，于是只好说：最早造字的人就是开创了刻画符号的人。“契”应读作qiè，正是“刻记号”的意思。《吕氏春秋》：“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就是证明。如果将来地下的发掘能提出确凿的证据，证明黄帝确有其人，仓颉确为其史官，那也只能说仓颉相当于秦始皇时代的李斯。他作为一个人，只能是文字的加工整理者，而不是创造者。真正

伟大的发明家还是那些无名的创契者。这些创契者也绝不生活于同一时代，甚至于一个字从初步设计成形，到被社会承认，都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个别字的生成过程，可能比我们人类的有成文可考的文明史还要长久。

那么，我们汉字的历史究竟有多久远呢？

目前，我们从地下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已看到了一些可作为文字解释的符号，不过太零散、太稀少了。因此，很难作出什么系统的研究。但是它却可以证明，起码在六千年前，汉字已经产生了。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古老的定型汉字是甲骨文。所以称之为甲骨文，是因为它是一种刻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1899年，人们第一次在河南省安阳附近的殷王朝都城遗址（殷墟）中，发掘出一批龟甲和兽骨，上面刻画着许多符号。经过研究辨识，发现它们是殷代的古文字，内容是殷代帝王进行卜卦贞问的记录，比如有一片是这样的：



写成现代汉字就是：

“𠄎”（珽）贞：今三月帝令多雨”。意思就是：“献珽贞问：今年三月，是不是上帝要让多下雨？”因为内容是卜卦的记录，所以人们又称它为“贞卜文字”或“殷契卜辞”；因为是在殷墟发现的，所以又称为“殷墟文字”。这些文字距今有近四千年的历史，是我们研究语言文字的最珍贵史料。甲骨文字是一种用金属刀具契刻在龟甲、牛胛骨、猪、羊、鹿骨或各种兽头上的刀笔文字，受书写工具的限制，一般笔画细长，朴直、简略，多为“瘦笔”，少见“肥笔”。从字形构造看，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不标音的字占绝对优势，标音的字大致只占20%左右；

（2）同音假借字很多；

（3）一字异形者很多。如：

“羊”字可写作：𦍋、𦍌、𦍍、𦍎、𦍇、𦍈等；

“降”字可写作：𠂔、𠂕或𠂖

“疾”字可写作𠂗。也可写作𠂘。

“焚”字可写作：𠂙、𠂚、𠂛；

可见，当时只重象形表义，笔画的多少和形态的变化无关紧要。表明它仍属于汉字的原始形态。因此对我们研究汉字的渊源，是极为重要的实物依据。

稍后于甲骨文字的，是殷周时代刻铸在青铜器皿上的文字，人们习称为“钟鼎文”或“金文”。这些文字大量见于出土的钟，𠂔bó，簠guǐ，簠fǔ，𠂔yǒu，壶，觥zhì，爵，𠂔jiǎ，角，尊，盃，鑑，匜yí，盂hē，戈，戟，剑，𠂔yǎo等铭文。金文是甲骨文的直接发展，时代比甲骨文晚，但从表义角度讲，有些字却保留着比甲骨文更古老的形态，如：𠂔(寇)，𠂔(周)。因此对研究汉字的表义性来说，也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字都是先刻在

泥质的铸范上，经过精心修描加工之后再浇铸成的，所以笔画圆润粗宽，多是“肥笔”和“圆笔”，只有极少数直接在器皿上契刻的字迹才是细瘦的。从字形结构上看，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 和甲骨文一样，形体也未完全定型。如：“盥”字就有盥，盥，盥，盥，盥，盥，盥等写法。

(2) 有标音符号的形声字大量增加。如宝(寶)字甲骨文只写作，象房子里有贝有玉，金文写作，是“缶”(杵臼)的象形，在本字中只是标音符号。

(3) 字形繁简化的发展倾向很明显，特别是春秋时代的金文，字形的变化极为多样。因为当时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动荡，政治、经济、文化变化多端，列国纷争，各据一方，互争长短，所以各国文字也各自为体。不同诸侯国，不同地区，文字都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比如“皇”字，秦国写成，蔡国写成 (蔡姑殷)，徐国写成，卢国的《鄫侯殷》则写作，而齐国的《陈逆殷》写作，《陈逆簠》写作，《叔夷钟》写作，《叔夷罍》写作，《陈昉殷》又写作。

后人把先秦时期的繁复的字体称作“大篆”，又称为“籀文”。“籀文”之称，是从《史籀篇》得名的。据说是周宣王时太史籀作的，当然也只是传说。

《说文解字》中记录了两百多个“大篆”字，把它们和同字的异体一对照，就可以明显地看出繁复庞杂的形体结构特点。比如：

楷书	小篆	大篆
乃		
砥		
歎(叹)		
誓(誓)		

比“籀文”出现时间稍晚的是所谓“石鼓文”。“石鼓文”是指唐代发现的刻在十块石鼓(济南石刻)上的文字，是公元前八世纪秦国使用的文字，也是属于大篆字体的一种。是后来的小篆的直系先祖。

战国时代，群雄继续割据，各自为政，“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文字形体上的地方色彩和异化现象更为突出。因此，在古代文字中，战国时期的所谓“六国文”是最难辨识的。如“工师”二字，楚国写成，齐国则写成。战国文字，今天我们除了可以从钟鼎等铭文上看到外，还可以从出土的战国兵器、陶器、货币、玺印、封泥、缙帛、竹简上看到。许慎在撰写《说文解字》时，因为没有见到比六国文更古老的文字字形，便把战国的文字视为“古文”，所以《说文》中所谓的“古文”，实际上是指战国文字，如“兵”，《说文》就先据小篆解释为：“兵，械也。从升持斤并力之貌。”又接着记述：“𠂔，古文兵，从人升干。𠂔，籀文。”

秦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巩固和发展大一统的社会局面，实行“书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进行字体的规范化。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由政府以法令手段推行的自觉的文字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三个：(1) 大规模地对大篆进行简化，如“败”，大篆写作，小篆简化作；“鸡”，大篆写作，小篆省作；(2) 使文字形体进一步符号化。如“目”字，金文写作，小篆写作；“涉”字，甲骨文写作，金文写作或，籀文写作，小篆写成；(3) 废除异体字，如“田”字，甲骨

文有田、𠂔、畱等写法，小篆则一律写作田。

小篆的确立，是文字形体的一大变化，它反映了文字由繁到简，由绘画到符号，由难以书写到容易书写的客观发展趋势。这是文字发展的内在规律，随着社会的进步，必然不可逆转地出现。但是小篆毕竟还没有完全摆脱绘画的范畴，书写起来难度仍大，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和中央集权的统一政治局面的出现，公文、书隶事务日益繁多，为了书写迅速方便，自然要求使用一种更为简易的字形。于是，几乎在小篆由秦政府大力推行的同时，便在社会上应运而产生了“隶书”。据说“隶书”最早是由狱吏程邈创作的。实际上，他可能和李斯一样，只是书写隶书比较整齐规范的一个代表者。真正的创造者，应是广大的下层书吏之辈。晋卫恒《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会隶人佐书，曰隶字。”是合乎隶书产生的实情的。

“隶书”又有“秦隶”与“汉隶”之分。“秦隶”实际上是小篆的草体字，所以人们又称“秦隶”为“篆之捷”。“汉隶”是与小篆的形体结构迥然不同的新字体。它打破了旧文字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大大提高了书写的效率。“汉隶”的产生标志着汉字演化史上的一大转折。正因为隶书是楷书的雏形，所以魏晋至唐，仍有沿称楷书为隶书的。

三、汉字的特点和识字的重要

汉字既然是表意文字，就必然具有一些与表音文字迥然不同的特点。

第一、形象性强。尽管现代汉字已失去了绘画性，只是一些象征性的特定笔画符号的特定组合，但它采用哪些形体符号组合，采用什么方式组合，仍然保留着相当大的形象性。人们借助于对这些具体形体符号和它们的结构形式的辨识，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直观地认识它所表示的语言意义。比如“从”，是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尖”是指上头小下头大的物体状态；“尘”是微小的土粒；“采”是买进米；“粦”是卖出米；“嵩”是山高；“卡”是形成了上不去下不来的状态；“掰”是指用两手分；“忐忑”，是指心情上下动荡不安，等等。当然，象这样能直接辨识清具体涵义的字，在汉字中为数并不很多。绝大多数汉字是形声字，一般不能直接显示出一个字的具体涵义来，但是人们仍然可以从具体形体符号上直观地辨识出这个字的意义范畴来。“簋”、“簠”、“盂”、“簠”、“盥”、“盟”、“监”、“盥”、“盥”等。人们可能并不一一认识它们。但可以判断出它们的意义（起码是本义），一定与器皿有关。由于汉字具有这种形体的直观性，所用的形体符号（点、横、直、竖、勾、撇、捺、）也仍然保持着绘画性质，所以自然就具有了形象的感染力，所有学习汉字的人，都要靠这种直观的形象感染作重要的记识条件，因此许多外国人把汉字称作“图画字”，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而汉字的书法也确实是一种美术。

第二、形声字约占汉字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这是文字由纯表意向音意兼表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反映。文字毕竟只是语言的记录手段，语言的直接表象是一系列有规律有意义的声音。语音是语言的外壳，语义是语言的内涵。人们在实际交际中，主要是由语音的交流来相互传达思想内容的。所以完全跨越语言的外壳，单纯靠表意文字来直接交流思想内容，是不可能作到完善、全面、尽善尽美的。因此，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必然要向音意兼表的方向发展。但是汉字表音符号的发展演变，还总是在以表意为主的根本条件的制约下进行的，具体表现就是：

汉字的形声字在选择音符时，也要尽可能地照顾到表义作用。比如：“牡”是指公牛，“牝”是指母牛。“土”和“匕”都是声符。在甲骨文里“牡”写作或，“牝”写作或。“土”又可作“𡗗”或“𡗘”，是表示雄性的文字符号，甲骨文中凡表示雄性的兽，都加有这种符号，如：“豸”，是公猪，𡗗是公羊，𡗘是公鹿等：“𡗙”是“匕”的初文，是表示雌性的文字符号，所以凡是表示雌性兽也都要加它，如𡗙是母羊，𡗚是母龟，𡗛是母虎，等。可见，在上古，“土”、“匕”二字组合于一些字里，原是意符，转化为形声字后，变成声符，同时仍起着一定的表义作用。再如“披”、“被”、“坡”、“陂”等字，都以“皮”字标音，“皮”是指野兽的外皮，而披、坡、陂、被等字的意义也都与“外表”，“表面”、“表皮”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形声组合而又尽量既表声又示意的状况，也是汉字的一大特点。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点：那就是字和词的高度统一性。从语言学的角度讲，字和词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词是语言的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意义单位，而字则是记录语言的一个语素或音节的书写符号。在表音文字中，这种书写符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形状的、代表一个音素的字母，利用这种字母的有规则的拼合，以记录语言的词汇。汉字是表意文字，它的符号的创立不以音素为考虑对象，而以意义为考虑对象。语言里可以独立运用的最小的意义单位既然是词，汉字就必然要以词为单位进行设计创造了。这样，从汉字的创立开始，每个字所记录的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词。再加上古汉语的基本词大都是单音节的，字和词的高度统一性也就显得更为突出。所以，对汉字来说，辨识清一个字的字义，也就是辨识清了一个词的词义。因此，古代的语文学者，在解释词义时，就说他们是在解字。《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实际上都是词典，却要以“字”相称，原因就在这里。比如“逆”这个字甲骨文写作，或再加上义符，繁写作，明显地是表示一个人倒着走路，正是表示“倒行逆施”这个意义的词。本义是“倒行”，倒行则不顺，于是又引申为“背逆”；“迎面而来”也可算“倒行”，所以又可引申为“迎接”。《说文》云：“逆，迎也，从辵，𠂔声。关东曰逆，关西曰迎”。说的就是这个引申义。（所谓“从辵𠂔声”，正表现了义符随着字形演变转化为声符的现象。）

所有单音节的基本词，几乎都可以以字义解释代替词义的注释。即使是后代形成的复合词，大部分也都可以充分利用字义的解析辨析清词的意义，因为组成它的每一个字现在虽各代表一个语素，原来也各是一个词，它们的本来意义仍然以不同的方式保留在由它们组成的复合词中。所以我们可以一般地说（因为不是全部如此）：了解字义是辨析词义的基础。

正因为汉字具有以上特点，所以对于学习文言文来说，识字是最重要的环节。识字的多少，等于掌握词汇的多少；识字能力的强弱，表现着解词能力的强弱，所以识字是语文阅读能力高低的一个主要标志。那么我们如何充分利用汉字的特点，来有效地提高我们的识字能力呢？我个人的见解和设想是：按汉字的表意性质把汉字的形体归纳为若干类，以归纳分析的方法，掌握各种基本字形所表示的意义范畴，从而把它们作为手段，执一驭万，掌握一套独立识字的方法。比如：凡包含有“止、少、止、足、舛、夊”等字形的字，意义都与脚或脚的行为有关，如“跖”《说文》云：“足下也”。段玉裁注曰：“今所谓脚掌也。”《吕氏春秋·用众》：“善学者如齐王之食鸡也，必食其跖”。“必食其跖”就是：“必定要吃它的脚掌”。“距”，《说文》云：“鸡距也。”本专指鸡脚向后突出的象脚趾的部分。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季氏介其鸡，郈氏为之金距”。说的就是这两家贵族嗜好斗

鸡，为了使自己的鸡格斗有力，季氏便给他的鸡带上甲冑，而邵氏则给他的斗鸡的距上加上了金属套。由于鸡距向后，鸡爪向前，两者间总是保持一定的间隔尺寸，所以又引申为“距离”等意义。“涉”是表示徒步过河的，而“步”是迈开两脚走路；“徒”则是表示“步行”，由此引申，用于军队则不乘车的士卒也称“徒”，《易·贲》：“公徒三万”，即是。“舛”（chuān）甲骨文写作,篆文写作,原本都象两脚相背，所以是“相背连，相交错”的意思。“夕”和“𠂔”都是表示脚的形体符号，所以带有这个符号的字，意思也多与脚的行为有关。如“舞”，是指双脚交错着作出各种姿势舞蹈。“违（違）”表示“背道而行”，“逢”表示两脚在道路上相遇。再如现代俗语叫“左耳朵”的“𠂔”，旧部首为“阜”，实际上是由甲骨文的形变来的，是表示山崖的符号，凡带有“𠂔”符号的汉字，意义大都与山崖有关，如“陵”是大山头，“防”是象山岭一样的堤坝。“陁”，《说文》云：“山绝坎也。”《尔雅·释山》云：“山绝，陁。”晋郭璞注曰：“连山中断绝”。宋邢昺疏云：“谓山形连延中忽断绝者曰陁。”“阴”是山的背日面。“阳”是山的向日面，等。如果熟知了一系列形体符号所表示的特定意义，对它们进行综合辨析，就可以相当有效地独立识字。比如“降”，由“𠂔”“夕”“𠂔”组成，知道了“𠂔”表示山崖，“夕”、“𠂔”各表示一隻头向下的脚，组合起来构成为两脚沿山崖，脚尖向下迈开步子走的形体，岂不正是由上而下的意思吗？（甲骨文的“降”字正写作,明显是象两脚沿山而下）；“陟”的结构方式与“降”相同，只是两脚变成脚尖向上的了，所以就是“上升”或“登高”的意思。又如凡包括有“彳、辵、行”等字形的字，意义都与道路或行路有关。因为“行”字，甲骨文写作,正是四通八达的道路的象形。“彳”是“行”字的半边，是“行”的省略符号；“辵”在早期的繁体汉字中写作“辵”，篆文作“辵”，“彳”是甲骨文“彳”变形，可见“辵”所显示的是一隻脚放在大路上的形象,自然就是“走路”的意思了。所以“徂”，《说文》云：“往也”；“逖”，《说文》云：“延行貌”；“迈”，《说文》云：“远行也”；“适”《说文》云：“之也”；“迹”，《说文》云：“步处也”；“造”，《说文》云：“就也”。如果遇到这些字形和其它表义字形组合成字的情况，则可如上述方法进行综合辨析。比如：“違”字由“辵”“韋”组成，而“韋”又是由“止”“口”“𠂔”三部分组成，“𠂔”不必再说，“止”也是“止”（止）的变形，“口”是表示一座城邑，两隻脚在一座城内背向而去，就是“背道而驰”之义，可见“韋”即“違”的初文，后来“韋”被借去表示了其它意思，才多加了个义符“辵”造成“違”字，使“行路”的意义更为明显。“迎”字由“辵”“印”组成，“印”篆文写作,明显地表现为两个人面对面相遇，可见“辵”“印”都是“人”的变形。两人面对面行路相遇，当然就是“迎”了。

这种将汉字形体，按表义归类的办法，自文字学兴起以来就是有的。比如许慎《说文》的五百四十个部首，《康熙字典》的二百一十四部首，直到《新华字典》的一百八十九个部首，《现代汉语词典》的二百五十个部首，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按形义分类的性质。尤其是《说文》的部首，完全依照“六书”的体系，按纯文字学的原则建立，表义归类的性质更为突出。但是，《说文》的部首只是以五百四十个可作为表义单位的字，代表五百四十类汉字意义范畴的归属。许氏并没有对汉字表义的形体符号作更为细微的分析，同时，由于他并没有看到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原形，仅根据已经发生过讹变的篆文形体作主观推断，许多判定

极不正确。因此,《说文》部首中的许多字形还可以按照它们所表示的基本意义再进行分析 and 归纳,形成新的表义符号归类,才更便于初学者掌握。比如:“止”“足”“夕”“又”“步”“舛”“𠂔”《说文》各分为一部,其实完全可归纳为“表示与脚或脚的行动有关的意义的形体符号”一类;“手”“爪”“又”“左”“采”“収”(𠂔)“大(六)”等《说文》也各分为一部,实际上也完全可归为“表示与手或手的行为有关的意义符号”一类。需要说明:我主张的“表义形体归类”不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字典检字法,而是要把构成汉字的基本表义符号分析出来,按意义范畴归纳成类,从而在体现汉字构成规律的前提下,为学习汉语文的人提供一种较为迅速地认识汉字的辅助手段。因此,我所说的“形体归类”和历来为检字而设立的“部首”以及单纯为分析字形而言的“偏旁”或形声字的义符(形旁)都不同。

第二节、文字学和“六书”

一、文字学和我国文字学研究的概况

文字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部门,以文字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文字的起源、发展、性质、体系,文字的形、音、义及其相互关系,正字法及各别文字的演变情况等。

两千多年前,文字学在我国就已萌芽发展起来。因为儿童入学首先要学文字,所以汉代学者称文字学为“小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早在周宣王时就产生了我国的第一部字书《史籀篇》是当时教育儿童的一种识字课本。《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宣公十五年:“故文,反正为乏”。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表明:起码在春秋之前,人们已经开始注意了对汉字构造的分析研究。战国时代更有发展。《周礼·地官·保氏》记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艺,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书”名称的出现,说明当时人们对汉字构造的规律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已经初步总结出一套理论,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配合统一文字的政策,特令李斯等用小篆编撰字书《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汉初,民间有人把上述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仍取名《仓颉篇》。以后,又陆续有了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表明文字学的研究在向纵深发展。不过,西汉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在文字学上的见解是相当荒谬的。比如有的人说“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见《说文解字·叙》)。真正奠定了我国古代文字学基础的著作,要算东汉时许慎的《说文解字》。该书以小篆为主体,兼收古文(实际上是战国时代的文字)、籀文。全书十四篇,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五个(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个),按五百四十个部首编排。依据“六书”,先解释字义,再分析说明字形,有的还用读若法注明字音。如:“唉,应也。从口矣声。读若埃。”“朮,木芒也。象形。凡束之属皆从束,读若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文字和考究文字源流的著作。对后代影响极大。我国古代的文字学研究几乎都是围绕着它或以它为研究对象进行

的。

晋朝的吕忱，继《说文》编成《字林》，《魏书·江式传》说该书：“文得正隶，不差篆意。”可见是我国第一部用隶书写成的字书。

南朝梁陈之间，顾野王仿《说文解字》体例编写了《玉篇》，是我国第一部用楷书写成的字书。它在字形分析上注重篆隶的变迁，不象《说文》只注重探“古文”籀文之原，因此对《说文》有所订正，是一部较好的文字学著述。

宋代，王洙等奉诏修纂、并由司马光等整理而成的《类篇》，是继《说文》《玉篇》之后，由政府支持编撰的一部大型字书，它继承《说文》、《玉篇》的体例，着重探讨字源，说明文字形体的变化并吸收了大量新字，讲古音、古训，在文字学上有一定的贡献。

自隶书楷书代替篆书通行以后，文字形体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字和俗体字日渐增多。于是人们开始注意研究文字的异同。唐代颜元孙著《干禄字书》一卷，以四声隶字为主，每字分俗、通、正三体，收录了不少当时已经通行的简化字，异体字、考辨相当详细，对我们辨识异体字和形似字有一定的帮助。

宋代郭忠恕的《佩觿》，李从周的《字通》也是这一类的著作。《字通》还创建了按笔画排字的检字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宋代可算我国文字学的大发展时代，当时，人们写出了许多各式各样的字书，从不同角度对文字进行分析研究，对文字学作出了贡献。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之外，娄机写了《班马字类》，专采集《史记》《汉书》所载的古僻字，分四声编次，进行考证训诂，辨别声音，对假借通用等字罗列很详细。郭忠恕还著了《汗简》，专录存古文字。所录的古字同近代出土的《三体石经》多相符合，大体可信。

宋元之际，戴侗撰写《六书古文》，批评许慎用小篆作本字，使人“不知制字之本”。因而他采用钟鼎文，钟鼎文没有的才用小篆。这自然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尽管该书过于泥古，所采用的文字又多杜撰，或误以俗字为钟鼎文。《四库全书总目》说它“非今非古，颇碍施行。”但在具体的文字解说上，却常有特殊见解，对一些字的考证也很精详。因此还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明朝梅膺祚著《字汇》十四卷，是我国古代一部较为通俗并且编排方法也比较进步的字书，在明代曾风行一时，因而为它做补编的不少。张自然的《正字通》，就是对《字汇》的增订和补编之作，不过引证繁芜，常有穿凿附会之说。

清代，是我国文字学的全盛时代，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文字学家和具有独到的精辟见解的文字学著作。他们对前人在文字学上所取得的成果，从各方面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评价，对我国文字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对《说文解字》进行了十分精深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果。这一点将在下面专讲。这里需要述说一下的是：在清代，随着钟鼎彝器的大量出土和甲骨文的被发现，古文字学的研究也得到了大发展，它把我国的文字学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所谓“古文字学”是指对甲骨文等上古文字的专门研究。本来早在宋代，研究钟鼎彝器以及铭刻于钟鼎碑石上的文字的所谓“金石学”，已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并已有了专著，如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即是。宋元之际的戴侗已注意用钟鼎铭文勘正《说文》的不当之处。但是限于种种原因，成就很小。开展古文字学的研究对促进整个

古汉语的研究是有重大意义的。第一，通过古文字研究，可以进一步发现一些文字的原始形体，明确它们的本义，从而更加明白汉字的源流及演变规律，特别对那些《说文》未收录训释的字，意义就更大了。如“其”字，很早就已是一个使用率很高的虚词了。它的本义究竟是什么呢？又是如何虚化了的呢？原来甲骨文中“其”写作，象簸箕形。可知它原是“箕”的初文，是被假借作虚词的。久假不还，才另造了“箕”字。第二，通过它，可以订正《说文解字》对许多字的误解，如《说文》解释“为”（爲）字是：“母猴也。其为禽好爪，下腹为母猴形。”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而甲骨文“为”写作，明显地象一只手抓住一只象，表示的是“驯象助役”的意思。还有一些字，《说文》的解释不错，但证据不足，通过古文字研究，就可以为它提供有力的佐证。如“自”字，《说文》解释为“鼻也”。在各种古籍中找不到例证，甲骨卜辞却有“疾自”的记载（见《殷墟文字乙编》6385），“疾自”就是鼻子有病的意思。第三，研究古文字资料，可以为古汉语的许多特殊语法现象提供有力的证明。比如：甲骨卜辞的“不其来象”就是使动句，“王吉兹卜”就是意动句。从而便证明使动、意动用法不是（如某些学者认为的）兼语式的简化，而是上古以来，汉语一直具有的一种语法现象。

我国“古文字学”的研究是从晚清才开始的。刘鹗（字铁云）是我国最早的甲骨收藏者。1903年，他在自己所藏的五千余片甲骨中选字迹完好的1058片，拓印成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书《铁云藏龟》。

孙诒让依据该书，于1904年写成《契文举例》，是我国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部专著。此后，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唐兰、于省吾、郭沫若、商承祚、胡厚宣相继对甲骨文作了许多深入的研究，为促进古史及古汉语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许慎的《说文解字》，及对它的研究和发展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它的历史功绩不容忽视。第一，它批判和结束了汉代以前人们对文字妄加臆测的作风，纠正了许多荒谬的说法。如：“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等，建立了按字形构造，依据文献典籍，实用文例，科学地分析研究字义，考究字原的方法，并且正确地指出了：文字是“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工具。对文字的功能提出了比较正确的看法。第二，系统地整理了汉字的构造方法，并把所收的九千多字按“六书”进行了分类（象形二百六十四字，指事一百二十九字，会意一千二百六十字，形声七千六百九十七字），对“六书”的理论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使汉字构造和使用的规律得到了具体的阐明，为我国文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三，创立了借助字形，探究字义的方法，对人们了解字义的源流，探索字（词）的各种意义的内在关系起了巨大的启发和帮助作用，大大促进了训诂学的发展。但是由于时代、阶级和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许慎深受封建天命观念和汉代谶纬学说的思想影响，又没能见到真正的上古原始文字，所以使他的《说文解字》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比如解释“一”字是：“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解释“王”字是“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都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封建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再现。另外，由于单纯依据小篆字形分析字义，往往望文生义，